

农文旅融合视域下乡村振兴的 实践路径探索

——以凤阳邑村为例

李璇, 唐瑶*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云南 大理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1日

摘要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云南省凤阳邑村为案例, 对该村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与农文旅融合现状进行系统分析, 揭示其在文化叙事断裂、村民主体性弱化、商业同质化等方面的现实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产业业态创新、文化空间转译、基层治理机制完善在内的多重实践路径。研究表明, 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应立足地方文化资源和乡村社会结构, 促进农业、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强化在地文化叙事建构, 完善村民参与和利益共享机制, 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 实现文化保护、产业发展、社区参与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推进。

关键词

农文旅融合, 乡村振兴, 文化资源, 乡村治理

Exploring Practical Pathway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ng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Fengyangyi

Xuan Li, Yao T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Dal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Dali Yunnan

Received: August 25, 2026; accepted: October 11,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1, 2026

*通讯作者。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serves as a crucial pathway for advanc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ing Village Fengyangyi,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village'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current state of integration. It identifies practical challenges—such as fragmented cultural narratives, diminished villager agency, and commercial homogenization—and proposes a multi-faceted practical framework that encompasses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spaces, and the refine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leveraging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rural social structures to foste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t emphasize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al narratives, improve mechanisms for villager 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sharing, and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involving diverse stakeholders, thereby achieving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sources, Rur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与文献梳理

1.1. 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产业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核心任务，也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经过一系列的产业发展探索和实践，农业、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区域资源整合、促进产业升级和重构乡村价值体系的重要路径。农文旅融合是指农业、文化与旅游三个产业领域在空间布局、产业链条和要素流动层面实现深度交叉渗透的产业发展形态。更为细化的分析，是将农业为基础，为农文旅融合提供生产空间和生态资源，必要时也作为一种景观参与其中；以文化为核心，在融合过程中将本地具有独特性的地域标识、历史记忆和精神价值进行呈现；旅游作为传播引擎，为前两者的价值实现提供市场通道和消费场景[1]。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价值倍增。

农文旅之间的融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农旅融合”，将农业及其相关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作为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旅游业态，实现农业与旅游的初步结合。第二阶段为“文旅融合”，即在旅游开发中注入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展演、非遗体验、民俗节庆等形式提升旅游产品的附加值。第三阶段为“农文旅深度融合”，也就是将农业、文化与旅游在要素配置、空间利用和组织形态层面实现深度整合，形成集农业生产、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综合性发展形态[2]。在第三阶段中，农业生产、文化开发、旅游产业都摆脱了单一的经济或社会行为，进而成为一种相互交织的综合性生活方式。农文旅融合不仅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

手段,也可以有效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为农村经济注入新动能。民族地区因民族文化、生态资源、国家政策等因素,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展现出天然的优势,但也面临着文化保护与开发、传统与现代转化、外部资本与社区利益平衡等多重挑战。

1.2. 研究方法

1) 文献法:利用中国知网、图书馆馆藏文献、融媒体中心音视频资料等媒介,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大量查阅有关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大理地区经济发展、凤阳邑村的地方史志、学术论文、专业论著和相关会议,新闻报道,强化理论依据和基础;总结现有研究的成果、趋势,发现不足。

2) 田野调查法:2026年3月~5月,进入凤阳邑村进行田野调查,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搜集村落在地信息,同时广泛参与凤阳邑村各项活动,最大限度熟悉并掌握凤阳邑村最新情况并获得生动鲜活的一手资料。调查过程主要采用客位调查法,即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表述和解释研究对象。因为本研究需要了解田野点居民的社会和环境关系构成以及乡村产业基础结构,包括他们的生产和再生产、行为模式(物质关系)等,相对主位调查,客位调查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3) 案例访谈法:根据实际需要,在田野调查前后及调查期间先后访谈凤阳邑村“两委”班子成员、村内文旅产业从业者、本地村民、村内旅居者、政府相关单位人员等共35人。多主体,多视角的访谈,能够为研究提供直接证据,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为研究的实践优化提供扎实的经验依据。

1.3. 文献梳理

从理论渊源看,农文旅融合早期研究多依托产业融合理论与系统耦合理论,阐释三大产业间要素流动、功能互补与协同演化的内在机理[3]。随后共生理论逐步被引入分析框架,将农文旅视为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构成的动态共生系统,用以解释不同要素间的融合基础与演化形态[4]。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初期,农文旅融合研究又以政策解读与内涵阐释为主,聚焦其作为国家战略回应的必然性,论证其在破解“农业低效困局”、抵御“文化空心风险”、扭转“人口外流趋势”等方面的多维价值[5]。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以农促文、以文兴农、以农强文”的逻辑内核,并逐步从单向产业带动转向双向深度互促[6]。随着研究逐步深入,相关议题也开始呈现明显的下沉与前沿化趋势:其一是聚焦特定村落、县域与革命老区的案例研究大量涌现,如云南扎西小镇[7]、福建坵演村[8]、广东柏桥村[9]、河南新县[10]等,深入剖析产业融合层次浅、文化挖掘不足、人才支撑薄弱等现实困境;其二是数字赋能与新质生产力成为新增长点,研究探讨数字技术通过技术赋能、产业融合与制度协同三重机制重构融合逻辑,同时警示数字精英垄断与文化异化风险[11];其三是研究方法趋于多元,旅游凝视理论、SWOT分析、障碍度模型等被引入,丰富了对主客冲突、文化原真性与生态平衡等议题的理解[12]。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融合”的边界与层次,学界形成了差异化认知。部分研究将其界定为产业层面的业态交叉与空间重组,强调以旅游业为引擎带动农业与文化的市场化转化[13];另有研究则从价值维度出发,主张农文旅融合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文化本真性保护、生态价值转化与乡村治理协同的复合过程[14]。不同的认知也在后续的研究中形成了诸多理论争鸣。第一是农文旅融合内涵的“工具性”与“价值性”差异。有的研究侧重产业经济视角,将农文旅融合视为提升农业附加值、扩大旅游收入的产业手段;另有研究则强调文化本真性与生态价值的优先性,认为过度商业化会侵蚀乡村文化原真性,导致文化表征与商业开发之间的矛盾[8][14]。这一分歧直接影响融合政策的目标设定与资源配置取向。第二是农文旅融合程度的“乐观”与“审慎”判断。测度类研究结论不一,部分地区性研究显示农文旅融合势头强劲、耦合度持续攀升[15];另一些全国尺度的评估则表明多数省份融合程度偏低,“双低”型地区占比较高[16]。不同指标口径、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的选择,导致了结论的可比性与稳健性存疑。第三是测度

方法的“客观化”诉求与“情境化”缺失。熵值法、耦合协调度等量化工具虽实现了“客观”测度,但其指标体系往往基于统计可得数据,难以捕捉文化内涵、社会关系与居民福祉等难以量化的维度,存在“重经济指标、轻人文内涵”的系统性偏差,在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特殊情境下的适用性亦受质疑[4][13]。

尽管已有研究从多个层面探讨了农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但案例研究各自孤立,缺乏对不同类型乡村的系统比较,理论的普遍性与条件的特殊性之间尚未形成有效对话[17]。文化异化、生态超载与利益联结脆弱等问题虽被提及,但针对性的治理机制与制度设计研究仍显不足,农民主体性与社区参与的落地路径有待深入探索[18]。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凤阳邑村为切入点,从农文旅融合在民族地区的微观机制、情境异质性、风险治理等层面为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2. 凤阳邑村的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

2.1. 村情概况

凤阳邑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苍山佛顶峰东麓、洱海西岸坝区,历史悠久,是云南保存较为完整的白族传统村落之一。根据地方史料和民间传说,凤阳邑村原名“砖窑村”,因村内盛产优质黏土,曾长期烧制砖瓦、陶罐而得名。后更名凤阳邑,寓意“丹凤朝阳”、吉祥兴盛、欣欣向荣。该村发展曾与滇藏茶马古道息息相关。滇藏茶马古道是古代大理乃至滇西地区商贸运输的重要通道。长期以来,来自滇西、藏区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盐巴、药材、皮毛等商品经由凤阳邑村运输流通,逐渐发展成为这条通道上的重要驿站和货物集散地。村内至今还保留着一条贯穿村落的古道。古道全长约一千九百米,宽约三米,据考证,始建于汉代,路面以青石铺砌,中间设有供马帮通行的“引马石”,两侧有石凳、铺台,成为见证滇藏商贸交流历史的珍贵遗存[19]。新中国成立后,因现代交通网络的发展,茶马古道的商贸运输功能日趋弱化,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凤阳邑村的商业活动也逐渐被农业替代。但村落较好地保存了旧时的建筑群落和茶马古道文化遗存,这些都成为了大理古代商业贸易、历史文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研究的重要实物载体。进入21世纪,伴随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凤阳邑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掘。2013年,凤阳邑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为大理州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代表。随后,大理州和大理市相继启动茶马古道凤阳邑段保护修复工程,对村内古道遗址、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系统保护和活化利用。2023年,因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村内取景拍摄,凤阳邑村热度飙升,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借此东风,凤阳邑村开始大力发展文化体验、民宿经济、非遗展示和乡村旅游产业,逐步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相融合的新发展路径。

2.2. 凤阳邑村农文旅资源禀赋

凤阳邑村农文旅融合的资源禀赋可以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产业资源三个维度分析。在自然资源上,凤阳邑村整体气候条件较为温和,东侧属于苍山的山地缓坡地带,是村民的聚居区;西侧则直接与苍山相连,是村内较为集中的田园区域,主要种植苗圃、蔬菜和粮食作物。整个村落自西向东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山地、农田与村落的空间格局。苍山的优质水质和丰富植被为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态环境打下了良好基础,众多田园景观也具备开展农耕体验、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的前提条件。文化资源方面,如前文所述,茶马古道的历史遗存和白族的民俗文化是凤阳邑村最具特色的文化资源。茶马古道、白族民居建筑群和本主庙等历史建筑,与现有的村落街巷、院落空间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完备的文化景观与文化记忆。扎染技艺、大本曲、木雕工艺等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农文旅融合提供了可能的丰富文化体验

内容。而产业资源中, 农业仍然是凤阳邑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功能已逐步向生态保护、景观营造和体验消费延伸。依托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洱河流域生态保护以及绿色发展要求, 凤阳邑积极发展绿色农业、庭院经济, 打造“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模式, 将农业生产与旅游体验相结合。另一方面, 各种影视剧和综艺取景拍摄推动凤阳邑村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消息, 凤阳邑村已经探索形成“文旅 + 影视”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文旅产业成为村庄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

2.3. 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成效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政策的推动下, 凤阳邑村近年来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 初步形成了以民宿经济、文化体验和创意产业为主导的业态格局。据统计, 目前凤阳邑村内已聚集民宿、咖啡馆、餐饮店和各类文创工作室等 40 余家固定经营主体, 形成了一定的旅游接待体系。这些新业态为当地村民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 增加了收入来源, 也有村民通过房屋出租或自营民宿获得了较高经济回报。其次, 大量游客来到凤阳邑村参观打卡、游览休闲, 对凤阳邑村文化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正向宣传作用, 此类的宣传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民对本村的文化认同。最后, 农文旅融合发展带动村落基础设施和环境品质的整体提升。道路硬化、卫生设施改善、传统建筑修缮等工程的实施, 使凤阳邑村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3. 凤阳邑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村民主体性弱化与利益分配面临挑战

农文旅融合的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村民的参与程度和受益水平。但在凤阳邑村的发展中, 村民主体性弱化的问题日益凸显。大量文创项目的引入和运营主要由外部艺术家和投资者主导, 村民在项目决策、空间规划和业态布局中的话语权极为有限[21]。这种外源主导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一些现实问题: 第一, 项目开发忽视村民的在地生活。许多文创空间和民宿的设立更多考虑的是游客的消费偏好和艺术家的个人需求, 在村内的开发行为中, 曾出现部分民宿、咖啡馆在建盖和运营过程中影响当地村民生产生活进而上升到“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 导致关系紧张。第二, 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农文旅项目引入后, 村集体可能通过资产经营、资源入股、项目合作等方式获得收益, 但村集体收益并不必然等同于村民个体收益。从权力关系看, 村集体分红方案的形成涉及收益核算、成员资格确认、资产价值评估和分配规则制定等多个环节, 这些规则通常需要经过村“两委”、经营主体及村民代表等主体协商确定。不同主体掌握的信息、表达渠道和专业能力存在差异, 决定了其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并不相同。比如, 当集体资产以资源入股方式参与项目时, 资产估值、股份比例、收益周期及风险承担方式均会影响村集体最终获得的收益; 当收益采取按户、按人口或按股份进行分配时, 不同家庭因房屋、土地、人口和历史贡献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差异也会进一步显现。但复杂的条款与计算方式令村民个体难以清晰地明确自己的收益分配模式以及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所以, 利益分配不均绝不仅仅源于收益规模不足, 更与收益规则由谁制定、资源价值如何评估以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能否进入协商过程有关。

3.2. 文化价值挖掘不足与商业开发同质化倾向明显

茶马古道和白族传统文化本是凤阳邑村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签, 但在实际发展和传播过程中, 却未能形成完整统一的叙事体系, 文化展示多停留于景观呈现和符号消费层面, 缺乏对历史脉络、民族文化精神和地方文化价值的系统深度阐释。“呈现、再造、移植、互动”是民族文化展示的基本模式[22]。在凤阳邑村, “呈现”多停留在单纯地外观层面, “再造”和“互动”层面(即让游客深度参与文化体验和意义建构)的开发则明显不足。文化展示与游客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存在距离感, 难以产生深度的文化共

鸣。受市场逐利影响,商业开发使凤阳邑村呈现出“景观化、节庆化趋同”的特征,缺乏对在地母题的有效转译和创新表达[23]。村内经营业态主要集中于民宿、咖啡馆、旅拍、文创零售等领域,经营模式和内容与大理古城乃至全国众多文旅小镇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性,存在“千店一面”“千村一景”现象。文化特色与产业特色未能实现深度融合,致使游客体验同质化、消费停留时间有限、产业附加值提升空间受限,不利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推进。造成这一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媒体以及文化经营主体往往具有较强的话语生产能力,可以决定“哪些文化值得展示”“以什么方式讲述”以及“什么样的乡村形象更容易被市场接受”。村民虽然是地方文化的日常实践者,却未必能够直接参与文化内容的定义和传播。由此可能出现地方文化被选择性呈现、生活经验被重新包装甚至文化意义被商业逻辑重新解释的情况。特别是在影视IP进入之后,凤阳邑的地方形象受到新的叙事框架影响,影视作品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意象具有较强传播力,在带动旅游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外界理解村庄的方式。

3.3. 组织治理机制不完善与协同治理效能不足

在凤阳邑村农文旅融合快速推进过程中,基层组织治理机制仍存在一定滞后性,难以完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发展需求。村级治理仍以传统的行政动员和经验治理为主,在面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宿经济、文创产业及旅游运营时,制度化、专业化治理工具相对欠缺,导致村“两委”在资源整合、项目统筹与利益协调中的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文旅企业、村民及其他外来经营主体的综合协调不够灵活,多元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合作机制。村内的村民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发育不足,使村民只能以个人身份面对市场,在对村集体经济以外的资本,尤其是大企业时缺乏集体谈判能力,利益表达渠道单一,在处理本地居民与外来经营者、旅居者之间的新社会关系时回应能力不足,跨主体协调和矛盾化解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政府在产业布局上也缺乏精细化的指导,使得村内业态更多依赖市场自发形成,保护传统村落风貌与鼓励产业发展之间的政策平衡尚需进一步探索[24]。这些都制约了当地农文旅融合的长远发展。

4. 农文旅融合视域下凤阳邑村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构建

4.1. 农文旅资源整合下的复合型业态培育

针对自身资源禀赋,凤阳邑应立足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资源、白族传统村落资源、特色农业资源和影视文化IP,通过打破农业、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的边界,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功能深度融合,逐步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复合型业态体系,以茶马古道为核心主题,构建贯穿上下游的产业生态链。上游环节包括古道商贸史、马帮文化、沿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学术研究和文化阐释等古道历史文化的系统性挖掘与整理。中游环节以文化体验产品的开发设计为主,如古道徒步旅游线路、马帮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茶文化研学活动等。下游环节则注重古道主题文创商品、特色农副产品品牌等衍生产品开发。可依托现存的茶马古道遗存,设计“古道寻踪”深度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身参与马帮文化的角色扮演——模拟马帮的行程规划、货物搬运、沿途歇息等,在体验中感受茶马古道的历史氛围。同时,亦可开发村内的民俗节庆,如结合白族传统的火把节打造“凤阳邑火把夜”,将火把节的祈福、歌舞、聚会等文化内涵和凤阳邑村的乡村生活以及夜间旅游相结合。由村民或活动主办方为游客介绍白族火把节的历史渊源、社会意义等,再以茶马古道和传统村落街巷作为主要游线,组织规模性的火把巡游。巡游过程中适当加入白族歌舞、大本曲、民间音乐等地方文化内容。巡游后可以进一步利用村内公共空间,设置“火塘会”,村民与游客共同庆祝,吃面条、听戏曲、喝茶聊天,甚至可邀请游客一起学习简单的歌调,使游客参与的重点由观看文化景观转向与当地人共同度过一个节庆夜晚,增强节庆活动的生活感,摒弃一次性的旅游演出,使火把节成为凤阳邑村年度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农业上较为可行的融合举措是建立将农业生产空间、田园景观空间和旅游体验空间三者统一规划、协同发展的“田园综合体”。根据法律和政策要求严格划定农业保护红线,在村落规划中明确保留一定比例的农业生产用地,确保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展体验农业和生态农业。结合村内已有的“三小”模式,进一步开发“认养农业”“农耕研学”等项目,游客通过认养一块田地,体验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同时借助电商平台对产品进行远程销售。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前提下,实现农业资源的体验化利用与消费前置化转化,增强农业生产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关联度,这有助于推动形成“游客参与-资源绑定-情感连接-价值转化”的新型互动业态。推动农业品牌化。以“凤阳邑”为品牌核心,大力申请地理标志商标,将本地特色农产品进行品牌化包装,并通过统一标准化生产、场景化营销以及文旅场景嵌入,强化地域标识与品质认知,提升农产品市场辨识度与溢价能力,以文化赋能与旅游导入,逐步构建起“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品牌体系,实现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的转化,增强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另外,影视文化IP打造也是凤阳邑村农文旅融合的重要业态。《去有风的地方》之所以能够促成凤阳邑村在网络上的爆火,核心是通过慢节奏、日常化的叙事方式,将村落空间嵌入人物情感与生活流动之中。村庄从“被观看”的对象,转为承载人物疗愈、交流与自我重建的“生活场域”。同时剧中大量保留了凤阳邑原生的白族民居、田园景观与日常生活场景,弱化人工布景痕迹,推动“影视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模糊化,最终超越了具体地理指向,使村落成为承载都市人情绪投射的文化容器。对此,凤阳邑村的影视文化IP应秉承从地理空间到叙事空间,从乡村景观到情感符号,从影视内容到文旅消费场景的打造思路,以“低干预、高真实”的空间形态提供影像拍摄场域。结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等文旅品牌,大力宣传凤阳邑村的慢生活、治愈系、返乡与重建自我等情感意义,完成村落从物理空间向情感空间的转化。在影视热度过后,持续通过短视频传播、网络再创作等方式,使IP进入“社交媒体再生产”阶段。乡村空间摆脱单一影视文本,通过持续内容输出与用户生成内容(UGC)不断被再定义,实现从“一次性影视流量”向“持续性文化IP”的转变,成为乡村发展的持续性内生动力。

4.2. 构建在地文化叙事与现代审美融合的空间形态

针对凤阳邑村文化展示碎片化问题,凤阳邑村应当推进文化空间的在地性转译。所谓在地性转译,其核心要义是在尊重本土文化基因和文化逻辑的前提下,立足传统村落的历史文脉与乡村生活肌理,运用现代设计语言对传统文化空间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形成兼具文化真实性、空间体验感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复合型乡村空间。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将废弃的传统院落和公共设施、空间进行适度公共化改造。在这方面,有先锋书店的成功运营实例可供借鉴:以书店为文化载体,将传统空间、地方文化、艺术活动与乡村旅游进行系统整合,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在地性的文化空间运营模式,将“书籍在地化、内容在地化、产品在地化”特点充分发挥。例如先锋书店大理沙溪白族书局,店址是对当地北龙村旧粮仓进行改造而来,内容则通过对地方文化进行系统整理,设置“滇”“大理”“白族”“茶马古道”等主题陈列,同时围绕白族民俗和沙溪地方文化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使书店成为地方文化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节点,系统展示茶马古道文化和白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丰富的建筑遗存和文化底蕴凤阳邑村均具备充分条件,接下来需要做的结合“旧空间+新功能+当代设计”,开发古建筑价值,既可积极对接先锋书店等成功品牌接入本地,也可进一步打造成村内独立专业的公共活动举办空间,在保持历史文化空间的真实性基础上,赋予其阅读、休闲、艺术交流和旅游体验等现代功能。比如定期举办乡建论坛和诗歌艺术沙龙等,以持续发生的文化事件不断激活利用空间价值,形成空间提供场所-活动导入内容-人群形成互动-文化持续传播的运营循环。二是加大数字技术手段的利用。目前凤阳邑村已经建立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可在此基础上增加声景导览系统(Audio Guide),将静态

的建筑、古道和文化遗存转化为具有时间感和故事性的体验空间。系统可采用“二维码 + 小程序 + 定位触发 + 耳机/手机播放”的方式,在古道、古井、传统院落、田园、茶园、影视取景点等节点设置声景标识,游客行至茶马古道,可听到经过设计与采录的“马帮铃声”,并同步了解古道运输、马帮生活等历史;到达古井,可以听到当地居民讲述用井、取水的生活记忆;走进传统院落,则可以通过村民口述了解建筑格局、家庭生活和村落变迁。以“一栋建筑对应一段声音、一处遗迹对应一段记忆、一条街巷对应一个故事”的形式,进一步增强文化空间的可感知性。

4.3. 社区参与机制完善路径: 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利益共享体系

解决村民主体性弱化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制度化的村民参与机制。实际上,我国在农村基层已经构建了相当完善的,以村“两委”为组织形态的农村村民自治体系,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设立有效的日常性议事规则。但在落实过程中,凤阳邑村侧重于决策型规则和执行型规则,议事型规则则未能充分体现^[25]。村“两委”、村民与开发者、旅居者缺乏有效的横向沟通机制,导致村民在村内开发建设过程中只是进行简单的房屋、土地租赁或就业,在规划和运营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所以,应有针对性的建立常态化的协商治理平台,如乡村发展议事委员会,在议事委员会中除吸纳村干部、乡贤、青年返乡创业者及普通村民代表外,也应将外来商业经营者、旅居者等外部群体,共同参与议事,对村内的旅游业态布局、公共设施建设、文化活动策划、环境治理、等事项开展民主协商,使各项决策在前期充分了解村民的意愿和诉求,真正反映村民的集体意志。此外,也可更进一步,充分利用乡贤、非遗传承人等本地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居民所长期积累的社会信任、地方知识和关系网络,组建纠纷协调队或工作室,对村内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本地居民与外来从业者、旅居者可能产生的矛盾进行协调与及时化解。传统权威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于行政权力和市场资本,其优势主要来自长期形成的熟人关系、地方认同和名声信誉。此举有助于弥补单纯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在地方文化认知与社区动员方面的不足。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绝不是恢复传统权威对村内事务的主导,而是在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框架下赋予其合理的参与渠道,通过制度化协商实现传统社会资源与现代治理规则之间的衔接。并且无论是协商议事或矛盾纠纷调解,后期均需要完善评价和反馈机制,对决策过程中各类人员的意见采纳率、参与覆盖率、满意度以及实施成效进行定期评估,提高乡村治理透明度和公信力,逐步形成村民愿意参与、能够参与、持续参与的长效治理机制。

在利益联结机制层面,目前凤阳邑村草编体验馆已采用“村集体 + 企业 + 农户”的利益双绑模式,村民以土地入股,村集体和企业按照比例分红^[26]。该模式使村民不仅获得稳定租金收入,还能够分享项目运营收益,实现长期利益共享,值得推广至民宿、餐饮等行业,构建完善的村集体经济链条。在利益分配上,依托协商议事机构同步建立村集体、村民代表、经营主体及第三方共同参与的利益协商机制,对重大项目投资、收益分配方案、公共资金使用等事项实行民主协商和信息公开。同时,建立收益公开制度和监督反馈机制,定期公布项目运营情况、收益来源及分配结果,接受村民监督,提高利益分配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减少利益矛盾,增强村民参与乡村发展的信任基础。此外,以技能培训和就业优先机制真正实现连农带农。村集体和企业定期为村民提供民宿管理、导游服务、手工艺制作、电商运营等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和村级合作社在招聘员工时,对本地村民倾斜。最后,从村集体经济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专项用于传统建筑修缮、非遗传承人培育、民俗节庆活动举办和公共设施维护,形成文化传承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

5. 结论

农文旅融合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乡村资源配置方式、文化生产

逻辑和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其发展成效取决于农业生产、文化保护传承、旅游开发与基层治理之间能否形成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而言, 乡村振兴在于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路径, 乡村发展的持续性建立在地方文化、社区社会和产业体系之间的动态平衡之上。在开放发展中保持文化主体性, 在产业转型中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在城乡融合中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为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经验。

对凤阳邑村的发展研究反映出, 民族地区农文旅融合面临的关键议题集中于文化价值转化、社区主体培育和治理能力提升。伴随资本、人口和消费需求持续进入乡村空间, 传统村落的发展逐渐由资源开发转向价值创造, 由空间更新转向社会关系重构。文化表达的深度、社区参与的广度以及利益共享的制度保障, 共同影响着乡村振兴发展的质量和韧性。缺乏地方文化支撑的产业开发容易削弱乡村特色, 脱离社区主体的发展模式难以形成持续的发展能力, 忽视治理机制建设则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失衡和利益分化。因此,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和民族文化特质, 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维护乡村社会结构完整性的基础上, 推动农业、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深度融合, 促进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传统村落的发展活力来源于经济发展文化、认同和制度保障形成的内生循环, 乡村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尊重地方知识、延续乡土文化、维护社区共同体结构, 使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基层治理形成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

基金项目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校级科研课题(编号: DNLKY2026XJ01)。

参考文献

- [1] 龙井然, 杜姗姗, 张景秋. 文旅融合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与模式[J]. 经济地理, 2021, 41(7): 222-230.
- [2] 王淼, 周永振. 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研究——以内蒙古红山区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24, 52(15): 143-145.
- [3] 白蒙蒙, 刘亚莉. 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优化路径——以新安县实践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6, 37(4): 156-158, 172.
- [4] 吕宛青, 肖钊富, 王旭熙, 等. 基于共生理论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机理与实证研究——以云南 4 个典型茶叶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5, 46(17): 238-254.
- [5] 王文娟, 张雪萍. 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与发展策略[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6, 37(4): 3-5, 13.
- [6] 谢朝阳, 李喆, 张红洁.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机理、困境和路径——基于农文旅跨界融合视域[J].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2024, 45(4): 1-4.
- [7] 武林, 廖雪蕾. 农文旅融合赋能革命老区乡村文化振兴实践路径研究[J]. 乡村科技, 2026, 17(5): 34-38.
- [8] 廖苏颖.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文旅融合的耦合机制研究——以福州市永泰县坛前村为例[J]. 南方农机, 2026, 57(5): 78-82.
- [9] 武文霞. 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广东茂名柏桥村的案例分析[J]. 南海学刊, 2025, 11(12): 45-56.
- [10] 冯霞, 王月, 苗双虎.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实现路径研究——以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为例[J]. 南方农机, 2026, 57(4): 92-95.
- [11] 李茂华, 梁顺荣, 王家新. 粤西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农文旅融合与数字赋能[J]. 乡村科技, 2026, 17(6): 64-69.
- [12] 刘丽娇. 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怀来县乡村振兴的 SWOT 分析及路径[J]. 现代农村科技, 2026(1): 144-146.
- [13] 王琪延, 杜治仙. 农文旅融合视角下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索研究[J]. 中国物价, 2024(12): 123-128.
- [14] 李静. 秦岭景区依托型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旅游凝视理论视角[J]. 西部旅游, 2026(2): 28-30.
- [15] 陈展图, 刘丽霞, 潘红丹.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自治县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以广西恭城为例[J]. 农村经济与

- 科技, 2024, 35(4): 129-132.
- [16] 侯智慧, 张宇佳, 萨茹拉, 等. 内蒙古牧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评价[J]. 现代农业, 2024, 49(9): 52-60.
- [17] 杨玉欢, 贺建雄, 张新红, 芮旸. 中国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理[J]. 干旱区地理, 2023, 46(3): 448-459.
- [18] 徐博, 踪程. 数字时代农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农业经济, 2026(3): 137-139.
- [19] 席欣雨. 文旅融合视角下艺术介入凤阳邑的策略研究[J]. 当代设计研究, 2025, 1(4): 90-95.
- [20] 大理凤阳邑村: 保护传统村落, 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EB/OL].
https://nync.yn.gov.cn/html/2024/xxqwx_0614/1412476.html, 2024-06-14.
- [21] 王申嫔.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以大理市凤阳邑村为例[J]. 热带农业工程, 2024, 48(3): 62-65.
- [22] 刘宏芳, 赵颖, 明庆忠等. 呈现、再造、移植、互动: 民族旅游古城镇文化生产模式及机理探究[J]. 人文地理, 2024, 39(6): 82-88.
- [23] 高霖. 影视取景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以大理凤阳邑村为例[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8): 39-41.
- [24] 毕晓红, 杨欢, 杨琴.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困难与对策探析——以云南省为例[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9, 13(6): 55-60+66.
- [25] 李周, 徐玉栋. 议事规则: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框架基础——以“蕉岭议事规则”为研究对象[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9(1): 11-17.
- [26] 大理市: 太和街道凤阳邑村促进文旅融合 助推乡村振兴 民族团结[EB/OL].
<https://ynswtzb.gov.cn/info/6488>, 2023-11-16.